

“多重关系”交互作用下的中法在非洲关系

张宏明

内容提要 法国和中国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中与非洲关系最为密切、在非洲影响最为广泛的两个域外大国，两国各自与非洲关系亦堪称是北南合作与南南合作的范例。法国曾经是非洲最大的殖民宗主国，与非洲关系源远流长、在非洲利益盘根错节，至今仍持有浓重的“非洲情结”，将非洲视为自己的禁苑。中国在非洲活动虽然起步较晚，却在 21 世纪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而且“走进非洲”的步伐强劲，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鉴于法国与非洲特殊的关系，随着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增加，使得两国在非洲利益发生摩擦，碰撞甚或冲突的几率上升。目前，中法两国互为在非洲最为主要的“利益攸关方”，亦可谓互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国在非洲关系实质上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如何在非洲相处的问题。从趋势上看，在全球化与多极化这两大时代潮流不发生根本性逆转的情况下，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中法彼此在非洲关系、中法两国战略关系以及中法各自综合实力此长彼消与国际体系变迁等“多重关系”的交互作用，仍然是影响中法在非洲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观察、研判中法在非洲关系走势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 非洲国际关系 中法在非洲关系 多重关系 交互作用

作者简介 张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7）。

进入 21 世纪以来，虽然法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名出现下滑，但争取“大国地位”仍然是法国外交战略的核心诉求，而法非合作也依然是巴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础性条件。尤为重要的是，随着非洲经济潜力的释放，巴黎看好非洲发展前景并将之视为“希望的大陆”和法国振兴的重要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启动后，中非关系呈现出持续快速发

展的良好态势，非洲日趋紧密地融入中国外交战略和发展战略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近年来，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国际反响越来越大，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增加，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在非洲的关系。^①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以下简称“论坛”）北京峰会后，中非合作的发展势头更加迅猛，而随着中国“走进非洲”步伐的提速，中国在非洲利益不可避免地要与法国在非洲利益发生交集。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 3 月下旬，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意在巩固中法两国战略关系，这无疑有助于中法在非洲关系的平稳发展；但就在两周前，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了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三国，其遏制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意图明显。这两个事件传递出相互矛盾的信息，凸显了法中在非洲关系的竞争性。而这或许才是现实中真实的中法在非洲关系，它既受到中法两国战略关系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各自与非洲关系的影响。

事实上，过去 20 年特别是近 10 年，中法在非洲已然发生利益摩擦、碰撞甚或冲突。目前，中国和法国互为在非洲最大“利益攸关方”，作为各自在非洲最大的竞争对手，两国各自与非洲关系的变化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彼此在非洲利益产生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无论是在中国国际战略中还是在法国的国际战略中，非洲都是作为一个局部而存在的，因此，如何协调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特别是两国战略关系，并通过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来维系中法在非洲关系的平稳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多重关系”交互作用所需的条件

法国与非洲的交往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殖民时期，中国与非洲的实质性交往则是近晚之事，它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深化所激发的中国对海外资源 and 市场需求的激增而勃兴的。站在中非关系特别是法非交往的视角来审视中法在非洲关系，两国在非洲发生利益交集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过去 20 年双方在非洲关系的演化也并不平静。影响中法在非洲关系走势的因素可以列举出很多，其中的基本因素当属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的变化、中法彼此在非洲关系的变

^① 张宏明：《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与非洲经贸合作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0 页。

化,以及中法综合实力此长彼消所引发的两国战略关系的变化等。从既往的经验来看,上述几组关系既存在有利于维系中法在非洲关系平稳发展的积极因素,也存在妨碍两国在非洲关系发展的消极因素,而且在不同时期,上述各种关系在其间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和多极化并行发展的大势下,世界主要国家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引发了大国战略关系、大国与非洲关系的重组,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又促发了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变化。随着大国与非洲关系中的“中国因素”的发酵及中国与非洲关系中的“国际因素”发酵及其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使得大国与非洲关系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边性质,而且也使得大国在非洲关系(包括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的演化呈现出“多重关系”交互作用的联动特征,实际上,现阶段大国在非洲的攻防态势亦可谓是“多重关系”交互作用的阶段性结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运用“多重关系”互动“原理”或方法解析“大国在非洲关系”并非是无条件的,因此,在运用“多重关系”互动“原理”或方法解析中法在非洲关系演化之前,有必要解析一下何为“多重关系”互动“原理”或方法,以及运用这一“原理”或方法所需满足的条件。

(一) 何为“多重关系”互动“原理”或方法

“多重关系”交互作用“原理”和层次分析方法是笔者在非洲国际关系问题研究中尝试运用的一种新的分析框架。^①如果以中国作为大国在非洲关系的施动者,所谓“多重关系”互动“原理”或方法,系指影响中国在非洲国际处境变化的三组不同层面的关系,即大国与非洲关系、大国在非洲关系、大国战略关系之间所呈现出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不过,上述三组关系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各自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或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变化更多的是在商业利益等事务性层面对大国在非洲关系产生影响,而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则主要在地缘政治等战略层面对大国在非洲关系构成影响。

而大国战略关系的走势则又受到处于此长彼消中的大国综合国力及其利益诉求动态变化的影响。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中国正是凭借持续加大

^① 张宏明:《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及其演化趋势》,载张宏明:《非洲发展报告(2013~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对非工作力度的累积效应以及自身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排位的提升,进而通过“多重关系”交互作用的传导、联动等共振效应,从大国与非洲关系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方向影响并改变着大国在非洲关系,同时也影响并改变着中国自身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当然,这种影响或变化的效果对中国而言是多重的,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但在现阶段,总体而言是利大于弊。

(二) “多重关系”交互作用所需满足的条件

运用“多重关系”互动“原理”或方法来解析“大国在非洲关系”需满足若干条件。以中国与其他域外国家在非洲关系为例,后者必须是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但并不是什么国家均可称之为“利益攸关方”。作为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必须满足下列条件:其一,这些国家与非洲关系非同一般,也正是凭借其在非洲的利益和力量存在,使得它们对非洲事务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二,这些国家不仅与非洲合作关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比较密切,同时也关注着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的活动,中国“走进非洲”不可避免地要与其在非洲利益发生交集、碰撞,进而引发其反应;其三,这些国家多为地区大国或强国,有些甚至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大国或强国,它们普遍关注中国的崛起进程,其与中国综合实力的消长影响着双方的战略关系等。

具体到中国,亦如是。如果要运用“多重关系”互动“原理”或方法来解析中国与其他域外国家在非洲的关系,中国自身也需要满足一些相应的条件:其一,中国必须是其他域外国家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这是一个基础性条件,如果中国与非洲关系平平,在非洲毫无存在感,那么中国在非洲就不会与其他大国发生利益交集,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也不会引起他国的反应;其二,中国的综合国力必须位居世界前列,并且是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大国;反之,如果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无足轻重,那么世界主要国家就不会经略与中国的关系,更不会关注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进而将中国作为其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在既往的国际关系实践中不乏其例,密特朗时期(1981~1995年)法国与中国在非洲关系便是其中典型的案例。

“多重关系”互动“原理”或方法之所以不适用于密特朗时期的中法在非洲关系,其中的一个基本原因或主要因素就在于这一时期的中法在非洲关系几乎不存在利益交集。比较研究显示,在冷战终结后的最初5年甚或10年,法国与中国在对非洲形势发展的判断、工作重心、投入力度、政策目标,

乃至重视程度、工作力度、进取精神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①然而，也正是由于上述差异，使得日后中法两国在非洲各有斩获、各得其所。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差异既是导致密特朗时期中法在非洲关系缺乏利益交集的原因，但同时其所造成的结果也成为日后中法在非洲发生利益摩擦甚或利益冲突的致因。这或许正是历史的辩证法。具体而言，在冷战终结后的最初5年甚或10年，法中两国对非工作的差异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法中两国在对非洲形势判断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冷战的终结使得非洲作为“欧洲侧翼”安全屏障的战略地位急剧下降，这一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到了法国对待非洲国家的态度，而且也影响到了法国对非洲形势的判断。加之，在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多数非洲国家发生内乱，于是“非洲悲观主义”论调在法国政界、商界蔓延，进而导致法国对非洲事务的关注程度明显下降，时任总理巴拉迪尔就曾在多个场合发表对非洲不再感兴趣，甚至将非洲视为法国负担的言论，^②法国舆论亦因此纷纷猜测巴黎意欲从非洲脱身。^③然而，就在法国对非洲前景持悲观态度的时候，中国则是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1996年首次出访非洲时就满怀激情地讲道：过去100年是非洲的“解放世纪”，今后100年将会成为非洲的“发展世纪”，中国对非洲的前途充满信心，同时也对中非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④

其二，法中两国的非洲政策及其工作重心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冷战结束后，法国对非工作的重点不在经济和民生领域，而在政治变革或良政建设层面^⑤；反观中国，初期先是政治、经济并重，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所激发的对非洲需要的变化，工作的着力点逐步移向经贸领域。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倾向愈加明显。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使得中国不再仅仅满足于获取资金和技术，对资源和市场的需求也迅速增大。与之相对应，中国的国际合作对象也逐步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主要面向发达国家，转而同时面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非经贸合作随之进入中国决策层的战略视野。而法国

① 参见张宏明：《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与非洲经贸合作研究》，第555~574页。

② P. Marchesin, *La politique africaine de la France en transition*, *Politique africaine*, N°58, juin 1995, pp. 91-106; Carol Lancaster, *Foreign Aid: Diplomacy, Development, Domestic Politics*, pp. 155-156.

③ Jean-François Bayart, *Réflexions sur la politique africaine de la France*, *Politique africaine*, N°58, juin 1995, pp. 41-50; Philippe Marchesin, *Mitterrand l'Africain*, *Politique africaine*, N°58, juin 1995, pp. 5-24.

④ 参见江泽民：《为中非友好创立新的历史丰碑》，载《人民日报》1996年5月14日。

⑤ 张宏明：《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226页。

在非洲力推西方政经模式得手后，其对非工作重心虽然有所调整，但其政策取向未发生变化，只是将工作着力点转向巩固“西化成果”，特别是强化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以及民主政治的文化培育。虽然进入21世纪后，法国又对其非洲政策作出调整，逐步从政治优先转向政治和经济并重，进而以经济为主导，但由于国力的衰退，法国对非洲的投入力度已经不能与中国相比。

其三，法国自视过高导致其对中国在非洲活动不屑一顾。在密特朗第二任期（1988~1995年），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之所以没有遇到来自西方大国的阻力，与当时法国自恃“非洲老大”，无视中国在非洲存在的傲慢心态是不无关系的。而巴黎的底气源于法国与非洲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关系，特别是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和力量存在，以及据此而在非洲所拥有的特殊影响力。应当说，法国的这种自信或自负也是有其缘由：一则当时中国的国力还比较弱，经济总量远远落后于法国；另则，当时非洲尚未进入中国决策层的战略视野，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和力量存在也的确无足轻重。惟其如是，在密特朗时期，法国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不屑一顾，法中双方在对非关系上也是各行其是，彼此之间很少关注，更谈不上交集，只是各自工作的侧重点和力度不一而已。

正是鉴于这一时期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和力量存在确无足轻重，加之法国与中国在非洲关系几乎不存在利益交集，因而，中国也就不可能成为法国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的变化，还是两国战略关系的变化，均难以对两国在非洲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冷战终结国际格局发生巨变的背景下，密特朗政府借1989年政治风波对中国实施“制裁”并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使法中关系跌入低谷^①，然而，由于中法在非洲少有利益交集，两国在非洲关系却几乎未受到两国战略关系变化的影响。但是到了萨科齐时期（2007~2012年）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中法战略关系的恶化，使得两国关系在诸

^① 法国利用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制裁中国，之后又于1991和1992年先后向台湾地区出售6艘“拉法耶特”护卫舰和60架性能先进的“幻影2000-5”战斗机。关于这段历史，中国时任驻法国大使周觉（1986~1990年在任）和蔡方柏（1990~1998年在任）在各自的著述中均做了翔实的记述。参见周觉：《挫败法国售台军火的前前后后》，载《湘潮》2004年第2期，第58~61页；蔡方柏：《我同法国六位总统的零距离接触》，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168~215页。

多层面都发生激烈的碰撞，两国在非洲关系自然难能幸免。究其因，一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越法国；另一方面，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拓展和力量存在已经达到了足以令巴黎忌惮的程度。关于这方面内容下文还将展开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言。

“多重关系”互动下的中法在非洲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洲国家间的交往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回顾中国与法国在非洲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演化历程，可以用总体稳定、偶尔波动加以概述。具体而言，截至 2007 年 5 月希拉克第二任期结束，中法在非洲关系基本上维系着一种各司其事、相安无事的局面，即便是密特朗第二任期中法关系跌入低谷时，两国在非洲关系依然是波澜不惊。但是到了萨科齐执政初期，随着“论坛”首届北京峰会后中国加快“走进非洲”的步伐，中法在非洲关系急转直下，碰撞频仍。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在非洲的大动作集中发生在 20 世纪的最后 5 年和 21 世纪的头 6 年，其时间跨度几乎与希拉克总统任期（1995 ~ 2007 年）相吻合，为什么中法在非洲关系在希拉克时期安然无恙，而偏偏到了萨科齐时期（2007 ~ 2012 年）则急转直下？原因在于，中国加大对非工作力度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其始点恰好与希拉克总统任期的始点相吻合。此后，中国在 2000 年启动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继而又在 2006 年出台“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召开“论坛”北京峰会同样也都是希拉克总统任期内。上述事件堪称是中非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们标志着中国“走进非洲”步伐的提速及在非洲活动频率的增加。或许运用“多重关系”互动“原理”或方法可以解析这个问题。

（一）希拉克时期的中法在非洲关系何以相安无事

中法在非洲关系在希拉克时期之所以波澜不惊，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大国与非洲关系”层面而言，当时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还不足以撼动法国在非洲的地位。其一，非洲，更确切地说，非洲的资源和市场潜力进入中国决策层的战略视野大致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但政策的实施效果并非朝夕之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滞后期并且是累积效应之结果。至少在希拉克第一任期（1995 ~ 2002 年），不要说中国对非投资、援助无法与法国比肩，即便是对非贸易也远远被法国甩在后面。其二，在冷战终结后的最初

10年,在大国在非洲的力量对比中,法国等西方大国在非洲占据着绝对优势,它们在非洲推行西方政经模式得手后,对继续掌控非洲局势信心满满。其三,在希拉克第一任期,大国在非洲的争斗主要发生在法国与美国之间,华盛顿在冷战终结后即明确表示不再默认法国在非洲拥有特权,转而提出大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这使得将非洲视作法国“后花园”的巴黎倍感压力,法美在非洲时有摩擦,这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或遮蔽了法国的视线。其四,中法两国关于非洲事务的沟通渠道畅通,自2005年6月在北京举行首次中法非洲事务正式磋商后,两国每年轮流在各自国家的首都举行非洲事务磋商。

较之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中法彼此战略关系对这一时期两国在非洲关系的影响更大。希拉克时期是中法建交以来两国战略关系不断上升的时期,希拉克入主爱丽舍宫伊始便着手调整法国对华政策。1997年5月希拉克首次以总统身份访华,两国一致同意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①,此举不仅使两国关系在经历了密特朗时期的波折之后触底反弹,而且渐入佳境。事实上,“这是中法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最高定位,也是我国首次同一个大国建立了发展面向21世纪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②2004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法期间,双方领导人又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③,法国再次率先成为与中国建立类似关系的西方大国,至此,两国关系日趋成熟并步入了历史上最好时期。^④比较研究显示,希拉克时期是中法战略互信稳步上升的时期,亦因此被一些专家学者称之为中法关系的“蜜月期”。中法两国政府也一致认为,“10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日益巩固,战略对话不断深入,经贸合作加速发展,文化交流更加活跃。中法关系已经成为不同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典范,其紧密性、示范性、战略性日益突出。”^⑤应当说,中法战略互信对稳定两国在非洲关系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① 参见《中法关于面向21世纪全面伙伴关系声明》,载《人民日报》1997年5月17日。

② 蔡方柏:《中法关系回顾与展望——中国前驻法大使蔡方柏访谈》,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4期,第4页。

③ 参见《中法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4年1月28日。

④ 作为中法关系步入“蜜月期”的见证人,吴建民大使(1998~2003在任)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这样记述道:“在我赴任时,中法关系正处于上升阶段”,到离任时,中法关系仍处于勃勃向上的上升势头。参见吴建民、施燕华:《在法国的外交生涯》一书的前言及正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⑤ 参见《中法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7日。

在冷战终结后的第一个10年，大国在非洲的竞争或争斗主要在法国、英国等“老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进行的。进入21世纪，大国在非洲关系的主角发生了变化，随着“中非合作论坛”机制的启动，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2006年是大国在非洲关系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开启了大国在非洲新一轮博弈的帷幕，但其主角却转换为西方大国和中国，为了应对中国在非洲的“攻势”，西方大国甚至大有联手抑华之势。2006年1月中国政府颁布“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后，特别是在11月“论坛”北京峰会召开前后，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大国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说三道四，英国政府官员甚至批评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法国官方和媒体虽也有所跟风。例如，12月14日法国国防部长米谢勒·阿利奥-马里在法国参议院抨击中国向非洲冲突国家出售军火，认为此举助长了当地的冲突；她还批评中国政府嘴上说的是与非洲建立互利双赢关系，但实则用心险恶，目的是瓜分非洲的矿产资源及提升自身在非洲的影响力。^①但总体来说，法国的反应还是有节制的，并未一味地推波助澜。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增加对法国在非洲利益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巴黎之所以对此持克制态度，原因在于：此时适逢中法关系的“蜜月期”，两国间的战略互信在一定程度上稀释或淡化了因双方在非洲利益摩擦所可能引发的紧张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中法关系在希拉克时期值得称道的几件大事与中非关系史上的几件大事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发生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法两国元首互访对方的故乡^②，特别是2000年11月希拉克总统访问扬州适逢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不久；无独有偶，2006年中国前脚刚在10月底送走希拉克总统，后脚就于11月初在召开中非合作论坛首届峰会。上述事件的发生或许真的只是巧合，但它们在时间上也确实形成了对冲，从而弱化了中法两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对法中在非洲关系造成的冲击，同时也反映出，较之两国各自与非洲关系及彼此在非洲关系，法中决策层更看重两国战略关系，对此，法国总统希拉克本人表述得非常清楚。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因素影响到了法国对中非关系走势及其对法国在非

^① Le Monde, 15 decembre 2006.

^② 1999年10月下旬，江泽民主席访问了希拉克总统的故乡科雷兹省；2000年11月下旬，希拉克总统访问了江泽民主席的故乡扬州。关于这段“佳话”的来龙去脉，参见吴建民、施燕华：前引书，第101~110页、178~181页。

洲利益影响的判断。一方面,在希拉克任期的大部分地区中国的经济总量落后于法国,加之,中国在非洲利益和力量拓展仍处于蓄势阶段,因而巴黎并未过分在意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另则,巴黎在此时还需要借重中国抗衡美国,法中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始终是潜存的,一般而言,法中关系的冷热与法美关系的疏密这两者之间是一种“逆相关”关系。冷战终结后美国凭借其超强实力,企图建立一超独霸的单极世界,而法国则与中国的主张趋同,主张建立多极世界。可以说,小布什第一任期(2000~2004年)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给法国带来的战略压力是促使希拉克政府“联华抑美”的一个重要因素。诚如让-皮埃尔·拉法兰总理(2002~2005年在位)所言,法中战略关系是构筑在多边主义这一个共同信念基础上。拉法兰直言不讳地指出,为了巩固世界稳定与和平,必须允许多种力量并存,如果只有一个超级大国,那就是等级制的世界秩序,不符合世界多样化的要求。^①正是基于法国自身的战略考量,2003年法国坚决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希拉克为此甚至不惜与小布什交恶。或许也正是基于“联华抑美”的战略考量,巴黎并未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做出过激的反应。希拉克总统确信中国是一个在世界上有着越来越重要影响力的国家,而法国的国际地位部分地取决于与中国建立关系疏密程度的能力。^②

正是基于法中之间的战略互信,巴黎在希拉克时期采取理性、温和方式处理因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增加而可能给两国在非洲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客观地讲,作为在非洲最具影响力的域外大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中国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伊始,法国便敏锐地感受到中国“走进非洲”的步伐在提速;2006年“论坛”首届北京峰会后,巴黎的这种感觉更加真切,诚如时任法国国防部长阿利奥-马里2006年12月14日在法国参议院发言中所言,“中国确实是非洲大陆的一个主要参与者,中国已成为紧跟法国之后的非洲第二大贸易伙伴国。”^③随着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增加,法中在非洲的利益摩擦已若隐若现,之所以并未酿成公开的利益冲突,主要得益于法中两国之间的战略

① 让-皮埃尔·拉法兰2005年11月16日在“外交学院论坛”所做的题为《国际形势及中法关系》的演讲,参见《外交评论》2006年第1期,第12页。

② 2006年10月24日,希拉克总统任在访华前夕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法国地位部分取决于对华关系, <http://www.chinanews.com/gj/zwgx/news/2006/10-24/809334.shtml>, 2018-09-02。

③ Le Monde, 15 decembre 2006.

互信，以及两国对非洲问题及时的管控。关于这一点，在希拉克总统任内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发表的《中法联合声明》中表述得非常清楚：“中法战略对话频繁且卓有成效，有力促进了双方在重大战略问题上的沟通，双方同意在已经就军控、防扩散和非洲等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协调的基础上，战略对话的议题可包括对非援助和发展等其他全球性问题。”^①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非洲问题已经成为法中决策层战略对话的重要议题之一，1998年1月，希拉克总统与江泽民主席的信函往来中已经提及中非关系及法中在非洲关系问题，^②此后，两国领导人依旧就法中在非洲关系保持着对话。客观地讲，在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西方大国纷纷对中国在非洲活动持战略疑虑的背景下，法中在非洲能够维系相安无事、总体平稳的局面主要得益于中法战略互信的稳步提升，但也离不开怀有“中国情结”的希拉克个人在其间的作为。希拉克不仅被视为“最熟知中国的西方政治家”^③，而且还非常注重与中国领导人之间的战略对话。由此可见，较之法中各自与非洲关系，法中战略关系对两国在非洲关系的影响更大，如果说希拉克时期中法战略互信对维系两国在非洲关系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那么到了萨科齐时期这个“稳定器”的功效则大打折扣。

（二）萨科齐时期的中法在非洲关系何以波澜迭起

非洲是法国海外利益最集中、传统影响最深的区域，惟其如是，巴黎始终对非洲另眼相看，并将非洲置于法国外交的优先位置。2007年5月萨科齐入主爱丽舍宫适逢由于中国强势“走进非洲”所激发大国在非洲新一轮博弈方兴未艾之时。一方面，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激增，使得法中在非洲竞争态势凸显；另一方面，法美中“三角关系”出现跷跷板效应，法美关系的升温导致法中战略关系出现松动。其结果，从“大国与非洲关系”和“大国战略关系”两个层面对中法在非洲关系施加负面影响。随着大国在非洲关系中的“中国因素”，特别是法中关系中的“非洲因素”和“美国因素”的发酵及其交互作用，使得以往相安无事的法中在非洲关系波澜迭起，摩擦频仍。

2008年可谓是中法在非洲关系的多事之秋。随着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累积效应的喷发，中非关系，更确切地说，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业已成

^① 参见《中法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7日。

^② 蔡方柏：前引书，第290~291页。

^③ 同上书，第280页。

为影响法中关系的一个新因素。基于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增加将侵蚀法国在非洲既得利益的担忧，巴黎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走进非洲”战略动机并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随着官方态度的变化，法国政客、媒体、学界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说三道四、妄加评议，诸如将中国“走进非洲”渲染为闯入法国“后院”的不速之客并且是对法国在非洲利益的蚕食；批评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方式是纵容非洲腐败政府的不负责任行为；将中国在非洲正常的经济开发活动蔑称为掠夺非洲资源甚或以“新殖民主义”相提并论；对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正常的军品贸易视为“向非洲扩散杀人武器”。此外，法国还会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苏丹达尔富尔、津巴布韦人权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并且利用北京奥运会之机将这些问题政治化。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巴黎的上述过激反应对法中在非洲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年一度的中法官方非洲事务双边磋商也在 2008 年被迫中断。

站在“多重关系”交互作用的视角来考察这一时期的法中在非洲关系，萨科齐政府之所以一改在希拉克时期对待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沉默”态度系由两方面原因所致。就“大国与非洲关系”因素而言，巴黎认为中国在非洲活动增加业已触动到法国在非洲利益，这是导致法中在非洲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一则，中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累积效应开始集聚喷发；另则，萨科齐入主爱丽舍宫之时又恰逢“论坛”北京峰会后中国在非洲利益和影响的快速拓展期，这在贸易、投资方面尤为凸显。以贸易为例，1995 年，即在中国着手加大对非工作力度之时，中非贸易额还只有微不足道的区区 39.2 亿美元，其在世界主要国家对非贸易的排名中甚至位列韩国（53.2 亿美元）之后，更难与当时非洲最大贸易伙伴法国（276.7 亿美元）比肩。^①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短短十几年间，中国一路赶超，先是在 2004 年一举超越英国和德国，之后又于 2006 年将法国甩在身后；2009 年中国超越美国一跃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中国与法国对非贸易的差距越拉越大。与此同时，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更是经历了几乎从无到“巨”的跨越式发展。1996 年，中国对非投资仅为区区 0.56 亿美元，在当年世界主要国家对非投资的排位中，无论是流量还

^① 1995 年与非洲的贸易额排名前 5 的域外国家依次为：法国（276.7 亿美元）、美国（261.2 亿美元）、德国（200.2 亿美元）、英国（129.4 亿美元）、日本（118 亿美元）。See 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10.

是存量，在前 20 名都难以寻觅到中国的踪影。然而到 2010 年，中国对非投资存量达到 130.4 亿美元^①，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中国与法国对非投资存量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收窄^②。

中国在非洲商业利益的跨越式拓展在感官上给法国人带来了强烈的冲击，随着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国际反响的增大，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博弈的帷幕徐徐开启，而不甘居人后的法国自然不会缺席，有时甚至还冲在前面。中国在非洲利益和影响的拓展被巴黎视为对法国在非洲利益和影响的挤压，这令巴黎深感忧虑和不满，随之，巴黎对中国在非洲活动的态度急转直下，一些法国政客和学者甚至将法中在非洲的利益摩擦上升到地缘政治争夺的高度。一时间，中非关系或中国在非洲活动成为法国政客攻击中国的靶标，法国媒体也推波助澜，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中国“走进非洲”描述为闯入法国的势力范围，将中国在非洲正常的商业活动描述为侵蚀了法国在非洲利益，“动了法国的奶酪”。2008 年法国记者塞尔日·米歇尔和米歇尔·伯雷合著的《中国的非洲：北京正在征服黑色大陆》^③ 创设了一个非常刺眼的法文词“Chinafrrique”（中国的非洲），因为过去只说“Françafrique”（法国的非洲）^④，即只是用“法国”作为定语来修饰非洲，“法国的非洲”似乎已成为法文中的一个专有名词，一个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用以描述法非特殊关系的专有名词，而今用“中国”作为定语来修饰“非洲”，加上副标题“北京正在征服黑色大陆”，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该书在描述中国的投资和援助给非洲带来变化的同时，字里行间也透露出作者对中国闯入法国“后花园”的无奈与不甘。无独有偶，2009 年 1 月 6 日法国电视五台在黄金时段播出的专题纪录片《红旗飘扬在黑色大陆》的内容同样也是这种心态的写照或宣泄。较之前者，这部由法国人莫诺导演的专题纪录片更加露骨，不仅影像画面凸显了中国在非洲的强势存在，“解说词”还直言不讳地将

① 参见《201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images.mofcom.gov.cn/hzs/accessory/201109/1316069604368.pdf>, 2019-04-10。

② Banque de France, Stocks d'investissements directs par pays, Français à l'Étranger (en valeur comptable), séries de 2000 à 2015.

③ Serge Michel et Michel Beuret, La Chinafrrique: Pékin à la conquête du continent noir, Copyright Grasset et Fasquelle, 2008.

④ 笔者曾就“Françafrique”一词的含义向法国学者和非洲学者求证过，该词直译为“法国与非洲”或“法非关系”，但该词用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含义。作为专有名词，该词一般用来描述法国与非洲之间存在的紧密而特殊的联系，据此，可以意译为“法非特殊关系”甚或“法国的非洲”。

中国人界定为非洲的“新征服者”，称中国人的足迹遍布非洲各个角落，目前在非洲的中国人数量已远远超过法国人；抨击中国人用廉价的制成品换取非洲的能矿资源无异于是一种掠夺；中国人在非洲正在取代法国人，非洲已经从“法国的非洲”变为“中国的非洲”。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实际上，自萨科齐主政伊始，协调法中在非洲关系就提上了法国政府的议事日程，诚如法国外长贝纳德-库什内所言，寻求与中国在非洲问题上取得更大范围的一致，将成为法国与中国高层会谈的焦点之一。^①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2008~2013 年在任）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即非洲问题也已成为中法之间的一个重要议题。^②

大国在非洲力量格局的新变化导致法国在非洲的影响相对下降，这使得法国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陡然上升。为了应对大国在非洲的新一轮竞争特别是中国在非洲的强势存在，法国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萨科齐之所以积极推动落实“地中海联盟”战略构想并且比其前任更加注重法非经贸合作，主要就是基于新形势下法国的国际处境的变化，法国对非洲的新需求，以及大国与非洲关系变化所激发的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变化。“地中海联盟”战略设想一旦成为现实，则不仅可以增强法国在北非地区的影响，而且还能够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形成犄角之势，进而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占据主动，以维系和巩固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和影响。

如果说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触动了法国在非洲利益是导致这一时期法中在非洲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那么其深层次原因则在于萨科齐时期法国的“大国战略”发生了微妙变化。在处理大国关系上，萨科齐并未“萧规曹随”，而是改弦更张，具体而言即改变希拉克对美国敬而远之甚或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做法，转而采取了修复法美关系甚或“拥抱美国”的政策取向。萨科齐主政后，巴黎在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与华盛顿协调甚或密切合作，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它象征着自 1966 年法国退出“北约”之后法美战略安全信任关系的恢复，同时也标志

① 2007 年 10 月 13 日，时任法国外交部长贝纳德-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在访华前夕接受《财经》专访，贝纳德-库什内此次中国之行是为萨科齐总统访华做准备，参见 2007 年 10 月 24 日《财经》杂志网络版，<http://www.sina.com.cn>，2018-09-02。

② 2009 年 12 月 17 日中国驻法国大使孔泉接受文汇报和欧洲时报联合采访，<http://world.people.com.cn/GB/11468504.html>，2018-09-02。

着法国正式“回归西方”。萨科齐总统本人亦因此而获得“美国人萨科齐”的绰号。法国“大国战略”的要旨是制衡与平衡，基于法美中三角关系的跷跷板效应，法国向美国靠拢，必然导致对华政策趋向务实。应当说，萨科齐政府“大国战略”重心的调整与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性，由于小布什第二任期（2005～2009年）华盛顿开始向多边主义靠拢，从而减轻了欧洲的战略压力，而美欧关系的改善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法中关系。随着法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与美国协调或合作一面的加强，法中战略关系遂出现松动。而这一切又系中国的快速崛起所引发的法中两国在国际体系中相对地位的变化所致，这种变化不仅给法国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忧虑，也使其一时难以适应。

2008年是法中关系发生逆转之年^①，法中关系由春光明媚转入风雨交加，此后的法中关系可谓是跌宕起伏、波折不断。毋庸讳言，法中关系的严重倒退，确有法国总统易人等偶发原因，但深层次原因还是两国战略关系基础出现松动，而这一切又源于法中两国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尽管进入21世纪伊始，法国人就不间断地对中国发展前景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预测，但是中国实际的崛起速度之快还是超出了巴黎的预期。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排位也不断前移。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经济总量完成了从世界第七位攀升至第二位的历史性跨越，其间，先后超越意大利（2004年）、法国（2005年）、英国（2006年）、德国（2007年）、日本（2010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法国的综合国力则相对衰落，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进一步削弱了法国在全球甚至在欧盟中的实力和地位。随着法中实力的此消彼长，巴黎在处理大国关系中所奉行的制衡战略中“联美抑中”的砝码明显在加重。

中法关系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其战略性，甚至可以说，两国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构筑在战略合作基础之上。希拉克时期中法关系顺利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① 2008年法中两国发生了一系列外交风波，诸如：法国媒体在拉萨“三·一四”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竭力抹黑中国，4月7日法方怂恿藏独分子猖獗活动导致奥运圣火巴黎传递受阻，巴黎市政府授予达赖“荣誉市民”称号，致使中法关系从此陷入低谷。后经艰苦努力，双方关系一度有所改善，但12月6日萨科齐坚持以法国总统、欧盟轮值主席双重身份在波兰会见达赖，导致中法关系坠入低谷。

就在于双方共同的战略需求^①，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就是构筑在两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地位的相近似，两国对自身和彼此角色认知的相类同，以及两国相互借重、制衡美国一超独霸的共同利益基础上。但是，萨科齐主政后，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削弱，特别是法中两国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以及由此导致的各自在国际体系中相对地位的变化，使得巴黎对待法中战略合作的依据和心态都发生了变化，这无疑弱化了法中联合制衡美国霸权的意愿。非但如此，在巴黎看来，中国的快速崛起正在改变着世界政治版图，这对法国乃至欧洲的地位形成了强有力挑战。随着巴黎在处理大国关系上态度的变化，法中两国在希拉克时期累积的战略互信被不断地销蚀，后者不可避免地要波及中法在非洲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法中关系在萨科齐时期并不是变得不友好了，只是从希拉克时期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热络状态回归常态而已；另则，无论是希拉克时期还是萨科齐时期，巴黎对华政策的变化与否都是基于法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从法中在非洲关系在希拉克和萨科齐这两个时期的演化过程中可以窥视到法中各自与非洲关系、法中彼此战略关系与两国在非洲关系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多重关系”交互作用中，虽然法中各自与非洲关系及法中彼此战略关系的变化，从不同的层面均对两国在非洲关系施加了影响，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两国战略关系。究其因，无论法非关系、中非关系多么重要，非洲在法中各自的国际战略中都是一个局部，它必须服从并服务于两国各自的战略大局。如果说希拉克时期法中在非洲相安无事主要得益于两国间的战略互信，那么法中战略关系的恶化也不可避免地会殃及两国在非洲关系，这已被希拉克时期和萨科齐时期法中在非洲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或案例所证实。虽然未来中法在非洲关系的走势不可能简单机械地复制过往的轨迹，但历史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它或将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两国在非洲关系的前景。

中国与法国在非洲关系前景

就全球范围而言，法国并非是中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随着

^① 参见《中法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4年1月28日。

两国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法国与中国已不在一个等量级上^①。但是，具体到非洲则另当别论，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就大国在非洲的力量对比而言，法国在许多方面依然无人比肩。鉴于法国与非洲之间的历史渊源及其在非洲所拥有特殊的影响力，法国无疑是中国在非洲最主要的“利益攸关方”，亦可谓是最大的竞争对手。过去10年，中法在非洲关系在“多重关系”的交互作用下呈现出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或新变化，从趋势上看，在全球化与多极化这两大时代潮流并行发展及其交互作用的趋势不发生根本性的逆转的情况下，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微观）、中法彼此在非洲关系（中观）、中法两国战略关系（宏观），以及中法各自综合实力此消彼长与国际体系变迁等“多重关系”的交互作用仍然是影响中法在非洲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观察、研判中法在非洲关系走势的重要视角。影响或制约中法在非洲关系走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两者之间何者更多一些，或何者发挥主导作用，同样也取决于“多重关系”交互作用的阶段性结果。

（一）影响中国与法国在非洲关系的有利因素

影响中法在非洲关系平稳发展的因素可以列举出很多，站在“多重关系”交互作用的视角来考察今后一个时期的中法在非洲关系演化趋势，其中最基本的因素依然当属中法两国各自与非洲关系及两国战略关系的走势。从既往的经验来看，上述几组关系均存在有利于中法在非洲关系平稳发展的积极因素。虽然中法在非洲关系的走势，不可能完全简单地复制以往的“线路图”，但是在相应的已知条件下，历史的经验还是值得借鉴的，它或将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两国在非洲关系的前景。

1. 两国战略关系有助于维系中法在非洲关系的平和态势。

虽然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对两国在非洲活动的影响更为直接，但其深层次因素，或者说主导因素还在于两国战略关系的走势。原因在于，无论是对中国而言还是对法国来说，对非关系只是中法各自国际战略的组成部分。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前者与后者是部分与整体或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从根本上说，非洲在法中各自国际战略的地位是由其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决定的。惟其如是，两国各自与非洲关系必须服从并服务中法两国的国

^① 2018年法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位退居第六位，中国经济总量虽然仍维系世界第二，但绝对值已大幅提升并且远远地将法国甩在后面。

际战略这个全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法在非洲关系的前景更主要还是取决于两国战略关系的演化，而法中关系的特殊性就在于其战略性，这种特殊性或将有助于调控两国在非洲利益分歧，进而维系两国在非洲关系平稳发展。

其一，法中战略关系具有平稳运行的政治基础。与中国一样，法国也具有独立外交的传统，其目的是争取“大国地位”，这也是戴高乐主义的精髓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法中两国因不满美苏对东西方阵营的操弄和控制，愤然扛起独立自主的外交大旗，以期摆脱各自在所属阵营中所处的从属地位。^①作为西方大国，法国率先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便是其独立外交的具体反映。法国与中国建交绝非出于经济利益之考量，而是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确切地说，维护独立主权和谋求大国地位的政治理念及相互借重的战略需求拉近了法中这两个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距离。在整个冷战时期，法国特立独行，通过制衡战略，平衡美苏关系，游走于东西方阵营，进而居间发挥大国作用。由此可见，法中关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战略合作基础上的，这或许也是法中关系有别于其他大国关系的一大特点。诚然，法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也几经波折，但是双方不存在地缘政治冲突，也没有历史遗留问题，尤为重要的是，目前法中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依然持相同或相近的立场，突出体现在：双方都倡导世界多极化，都主张用多边主义应对全球性挑战。这表明法中战略合作的基础依然还在，至少在未来几年内两国战略关系的前景是可以预期的。作为法国新生代政治家，马克龙主政后虽然在内政方面提出了诸多新主张，但是其外交理念与戴高乐是一脉相承的，他本人也以戴高乐主义传人自居，他将法国的安全、独立和影响力确立为外交工作的重点，其核心目标依然是争取“大国地位”。^②

其二，法国仍有在战略上借重中国的实际需求。如果说独立自主这一共同的外交理念构成了法中战略合作的政治基础，那么两国对国际格局多极化的共同期许，以及对国际秩序特别是全球治理相类同的政策主张则成为维系

① 参见居伊：《中法关系50年：合作的基础和新型关系的构建》，载《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1期，第89~90页。

② 2017年8月29日，马克龙总统在法国驻外使节年度会议上发表讲话，首次公开系统阐释其外交政策。Le Monde, 30 août 2017.

两国战略关系的黏合剂。例如，法中两国都倡导国际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旨在垄断或主宰国际事务的单边主义政策；主张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多边主义合作；倡导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开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等等。上述共识使得法中两国可以超越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或分歧，建立战略伙伴关系。^①较之奥朗德特别是萨科齐，时下马克龙总统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新形势下对以戴高乐主义著称的法国独立自主外交传统的回归。法国国际战略的目标是构建多极世界，法国则在欧洲这一极中发挥“大国作用”。在巴黎的战略构想中，多极世界的要旨是维系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以达到相互制衡的均势局面，然而，国际政治舞台是一个以实力为后盾的博弈场，欧债危机后法国经济持续低迷，综合实力的下降使法国在大国中居间发挥独特作用的平衡者角色有所弱化。因此，虽然法国怀有“大国情结”，但它也深知仅凭“单打独斗”难能有大的作为。特别是在特朗普执政后，基于“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考量，华盛顿大行单边主义之道。在此背景下，法国仍将在战略上借重中国的实际需求（准确地讲是中法两国在战略上相互借重）。^②马克龙之所以重视发展对华关系，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商业利益，同时也想借力中国来拓展法国的国际回旋余地。

其三，法美关系间隙有助于维系法中战略关系。法中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始终是潜存的，有时甚至成为法中关系变化的“晴雨表”。从以往的外交实践来看，法中关系与法美关系具有某种程度的“逆相关”关系。在常态情况下，法中关系更多地受制于法美关系：法美关系不睦，法中关系则趋好；反之，法美关系向好，则法中关系易发生波折。就法美关系的现状而言，特朗普政府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政策主张导致西方国家所尊奉的共同价值观出现严重裂痕，突出体现在：美国所奉行的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或逆全球化政策与法国的政策主张格格不入。过去一年，法美围绕全球治理问题所产生的裂痕非但未能弥合，相反还呈现扩大之势。马克龙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也因政见相左而出现间隙，彼此对对方的不满情绪已趋于公开化。从目前的情况观察，如果华盛顿不对奉行的政策做出调整，至

^① 参见王毅：《中法关系中的战略三要素——纪念中法建交40周年》，载《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第23页。

^② 李洪峰：《马克龙当选总统后的法国外交展望——法国智库学者巴泰勒米·库尔蒙访谈录》，载《法语学习》2017年第4期，第57页。

少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法美关系很难回到萨科齐时期甚或奥朗德时期。基于法美中三角关系的跷跷板效应，时下的法美关系及其走势总体来说是有助于维系法中关系平稳发展的。另则，法中关系在经历了萨科齐时期的波动之后已趋于成熟，巴黎也基本摸清了中国的底线，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否则，巴黎不会再轻易触碰中国的底线或做出大的出格举动。总体而言，马克龙在发展对华关系上持“中性”偏积极态度，将中国定义为“既是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将法中关系视为“竞合关系”，但基于法国自身利益的考量，在行动中，马克龙奉行积极的对华政策，因此，在 2018 年 1 月和 2019 年 3 月两国元首成功实现互访后，法中战略关系总体稳定态势将不会发生逆转。

综上所述，虽然法中关系在马克龙时期或许很难回到希拉克时期的水平，但是，基于上述因素或理由，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法中两国关系将平稳发展，至少可以避免出现大的波折。其依据是：以法国现时的国力，只要巴黎仍想抗衡美国自私自利的单边主义政策，就会寻求国际力量的支持，而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中国仍不失为法国可以、也必须借重的国际力量。特别是在美国以各种“退圈”方式逃避大国责任之际，法中两国在应对“逆全球化”、气候变化、核扩散危机等方面的合作尤为重要。这将促使巴黎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审视和处理法中关系及法中在非洲关系，进而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持克制、理性或开放的态度，这无疑将有助于维系中法在非洲关系的平稳发展。从趋势上看，只要法中战略关系不发生重大变故，两国在非洲关系便是可控的。

2. 巴黎在处理法中在非洲关系问题上已趋于成熟和理性。

法国与中国在非洲互为“利益攸关方”，双方在非洲的利益交集（包括摩擦、冲突等）在所难免。当然，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两国在非洲利益交集的焦点和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2006 年“论坛”北京峰会后，由于法中战略关系走势、法中各自与非洲关系变化特别是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等因素的影响，法中两国在非洲已然发生了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不过，经过最近 10 年的较量和磨合之后，目前法中两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已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法中在非洲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矛盾，政策主张各持己见，利益摩擦依然存续，但随着法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适应力和承受力的提高，巴黎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或许不会再像以往那样一味意气用事，而将

趋向于以理性态度处理法中在非洲关系。

其一，法中在非洲关系已从互不适应过渡到相互适应的阶段。作为与非洲关系密切的域外大国，法中两国在非洲互为最为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因此，任何一方与非洲关系的变化，或任何一方对非洲政策的调整，都会引起另外一方的关注并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对另外一方在非洲的利益产生影响。回望21世纪第一个10年后期法中在非洲关系的较量，两国在非洲的争斗更多的是以一种“暗战”的方式进行的，在此过程中，法国不仅明里曲解、阻挠中非合作关系，而且还暗中挑唆非洲国家的各种利益集团掣肘中国在非洲正常的商业活动，为了达到目标甚至使用卑劣的手段。法中在非洲关系在经历了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急剧变化”和“剧烈冲突”之后，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两国在非洲的较量业已告一个段落，至少是第一个大回合较量的波峰已过。巴黎业已意识到，中国“走进非洲”是中国崛起、成长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必然趋势。在中国“走进非洲”无法阻挡的大势下，法国只能选择顺势而为，这促使巴黎在处理法中在非洲关系时逐步回归理性。虽然中法双方在非洲的政策分歧难以协调，利益摩擦或冲突依然存续，但随着法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适应力和承受力的提高，巴黎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已经有所变化，奥朗德时期巴黎在处理法中在非洲关系所做出的政策调整便是例证。实际上，在萨科齐主政后期，巴黎在处理大国在非洲关系方面的政策就已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不管情愿与否，面对中国强势“走进非洲”这一不可逆转的现实，萨科齐总统只能无奈地表示非洲不再是法国的禁脔，法国不反对非洲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上述言论见诸法中在非洲关系则体现为，法国不仅于2009年主动提议恢复与中国就非洲事务的司长级磋商，此后还就两国在非洲开展“三方合作”事宜与中国进行磋商。简言之，法中关系在非洲关系在经历跌宕起伏之后业已趋于成熟。现有一些迹象显示，法中两国在非洲关系正在逐步走出各自互不适应的阶段，转而步入彼此相互适应的磨合期，目前法中在非洲关系处于一种相对平稳的“竞合”状态。

其二，中法可通过双边磋商机制管控两国在非洲的利益冲突。法中在非洲关系趋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两国已就非洲事务建立了通畅的官方沟通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两国在非洲发生利益摩擦或冲突，也可以通过双边会晤机制及时加以协调、管控，不至于使局势失控。法国是率先并主动

与中国就非洲事务进行磋商的西方大国之一^①。法中非洲事务磋商机制是1997年中法“全面伙伴关系”建立后两国启动的一系列战略对话机制^②的组成部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法国是与中国就非洲事务进行磋商最为频繁的国家，两国自从2005年6月在北京举行首次非洲事务正式磋商后，截至2018年10月，双方业已进行了12轮磋商^③，除了2008年因受两国关系恶化影响中断一次之外，两国每年轮流在各自国家的首都举行非洲事务磋商。可以说，法中非洲事务磋商机制的启动和运行使得两国对非政策磋商方面实现了机制化，这对于管控两国在非洲的利益分歧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一是借助中法非洲事务磋商机制，双方可以了解彼此对非洲政策的新变化及各自在非洲活动方面的情况，并就共同关注的非洲问题及两国在非洲合作事宜深入交换意见。二是法中就非洲事务加强沟通交流，无疑有助于提升双方对各自在非洲活动战略意图的透明度，特别是消解法国对中国在非洲活动意图的猜忌、担忧或误解。三是在法中在非洲发生利益摩擦或利益冲突时可以起到释疑解惑、管控分歧、防止事态恶化或失控的作用。

此外，法中非洲事务磋商机制还为协调或加强两国在非洲事务方面的合作等提供了一个平台。从实际效果来看，近年来中法非洲事务磋商也是最富有成效的，这也是促成2013年10月30日两国外长就进一步加强双方在非洲事务中磋商与合作达成共识的重要因素。相关政策主张还在2014年3月26日两国发表的《中法关系中长期规划》文件中已得到充分体现，在该《规划》的第二部分“国际和全球问题”的第三款和第四款载明：中法将“加强在非洲事务上的双边对话，为非洲国家实现非洲稳定与发展提供支持和配合。加强在非洲事务上的司局级磋商，重点推动地区一体化和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中法还将“增进在发展问题，特别是非洲发展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支

① 1997年法国与中国就非洲事务在巴黎进行首次非正式磋商，双边司长级正式磋商于2005年在北京举行。

② 这些机制包括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政治磋商机制、外长定期会晤机制、中方副外长和法方外交部秘书长定期磋商机制、常驻联合国代表磋商机制、经贸混委会、国防部战略对话机制中法科技合作联委会、中法非洲事务磋商机制等。

③ 历次法中非洲事务磋商的时间和地点为：2005年6月在北京，2006年8月在巴黎，2007年11月6日在北京，2009年6月在巴黎，2010年9月在北京，2011年6月14日至15日在巴黎，2012年6月在北京，2013年8月在巴黎，2014年10月在北京，2015年5月在巴黎，2016年3月在北京，2018年10月在巴黎。此外，2013年2月19日，在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前夕中法还举行了一次涉及西亚北非事务的司局级磋商。

持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制订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进程中加强沟通协调。”^①

需要指出的是，法中双方除了司长级非洲问题定期交流机制之外，两国间的高层战略对话中也时常涉及提到非洲问题，事实上，从希拉克起，法国总统几乎每次与中国领导人会晤都会涉及非洲议题。此外，还有一个有利的因素是，在能够影响马克龙的对华政策的法国政界人士中，对华友好的不乏其人，诸如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前外长贝尔·韦德里纳等。其中韦德里纳不仅深谙非洲事务，而且是一位对法国非洲政策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曾于 2013 年 12 月受法国经济财政部委托，领导的“法非经济关系调研小组”研究制定并发布了一份长达 166 页的“振兴法非经贸合作的对策建议报告”。该报告针对法国在非洲市场份额下降状况和非洲经济增长前景，就法国如何在新形势下开拓非洲市场提出了 15 项建议。^②

基于上述有利因素，我们没有理由对中法在非洲关系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确切地说，只要国际政治生态和世界经济形势不发生重大变故，只要华盛顿仍旧一意孤行地推行“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法中战略关系就将继续平稳向前推进，至少不会发生逆转。这意味着今后一个时期中法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即便不会一帆风顺，甚或因法中各自对非政策差异而发生利益摩擦甚或利益冲突，但其过程、烈度也将是可控的。

（二）影响中国和法国在非洲关系的不利因素

由于法中各自与非洲关系、彼此在非洲关系、两国战略关系的变化及其交互作用所产生的联动效应本身也受到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国际政治环境、世界经济形势以及中法各自综合国力、内外政策等诸多难以预测或掌控的变量因素的影响，这就使得法中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原因还在于，非洲系支撑法国“大国地位”之重要依托，失去了非洲，法国将彻底沦为一个“二流国家”，因此，法国难以容忍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持续快速提升，因为这事关大国在非洲的力量平衡，特别是事关法国主导的大国在非洲

^① 参见《中法关系中长期规划》，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3/27/c_119981279.htm, 2019-01-14。

^② Un partenariat pour l'avenir: 15 propositions pour une nouvelle dynamique économique entre l'Afrique et la France, Rapport au ministre de l'économie et des finances, 4 Décembre 2013, remis par Hubert Védrine.

秩序的存续。法中在非洲的“结构性”矛盾预示着两国在非洲关系是竞争性的。鉴于法中在非洲关系的实质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如何在非洲相处的问题，因此，我们立足于底线思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正所谓有备无患、防患于未然。

1. 法中实力的此消彼长或将使两国战略关系的基础出现松动。

无论对法国而言还是对中国来说，法中关系均非彼此最为核心的双边关系，两国与美国的关系才是各自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因此，尽管法中关系具有战略性特征，但是这种战略关系是构筑在两个“二等大国”联合制衡一超独霸、唯我独尊的单边主义的威胁基础上的。说到底，法中合作是基于彼此相互借重的战略需求，而这种合作关系的存续是有条件的，它一方面取决于战略制衡对象美国的相对地位和行为方式如何变化，同时也取决于中法双方各自与战略制衡对象美国之间关系如何变化。换言之，法中关系的疏密或远近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彼此综合实力的变化所引发的各自与美国关系变化的影响，一旦美国外交向多边主义回归，法国联合中国制衡美国的动力就会锐减。^①

在萨科齐时期，法中两国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特别是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使得法国联合中国制衡美国的意愿或动力有所减弱。奥朗德时期（2012~2017年），为了对中国持续快速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加以制衡，巴黎在法美关系、法中关系的天平上，基本上延续了萨科齐时期的做法，明显地倾向于美国。从趋势上看，法中两国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定式：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性大国，而法国则因综合国力的衰落，其国际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即便在欧盟内部也受到德国的挤压。法中各自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相对位置的变化，或将促使巴黎重新审视两国合作的既有基础。据此，法中战略关系的走势，不仅取决于法国自身实力及其所依托的欧盟力量的变化，还与法中关系中的“美国因素”密切相关。

尽管马克龙不像其前任奥朗德特别是萨科齐那样亲美，但是基于法国国际战略的制衡性特征，随着法、美、中力量对比的变化，法中战略互信的程度很难再回归希拉克时期。马克龙在处理法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策略上或许

^① 张骥：《去特殊化的中法战略伙伴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第104页。

会随着“时空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但法国国际战略的基调不会发生变化。由于法国国际战略本质上是一种制衡战略，目的是确保法国能够大国博弈中居间发挥“大国作用”。为了防止法国在国际权力游戏中被边缘化，巴黎既不愿看到美国一超独霸、颐指气使，也不甘心中国后来居上甚或取而代之。就目前来看，马克龙的国际战略基本沿袭了以戴高乐主义—密特朗主义著称的法国外交传统，其要旨可用欧洲主义、多边主义及非洲主义加以概述。其中，欧洲主义是马克龙外交思想的核心内涵，同时也是其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环。马克龙之所以反复强调“欧盟即我们，我们即欧盟”这一政治理念，并不断重申重振和重塑欧洲的决心，目的是争取法国对欧盟事务的主导权，进而依托欧盟在大国博弈中居间发挥独特作用、彰显法国的大国地位。诚如马克龙在《变革——为法国而战》一书中所言：“为了重新掌握法国的命运，我们需要欧洲”；否则，“我们将很难与中国或美国抗衡”。^①

从趋势上看，为了确保法国国际权益的最大化，马克龙或将继续奉行“双重制衡”政策：既联中抑美，亦联美制中，至于倾向于何者，或以何者为重，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鉴于法国目前在防务上还不具备战略自主性，加之与美国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取向上的趋同性，法国的“联美制中”与“联中抑美”在性质上是有差别的。不管马克龙对特朗普上台后多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如何反感，也无论法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如何特立独行，就意识形态取向而言，法国仍然归属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诚如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智库学者巴泰勒米·库尔蒙所言，马克龙在外交上是比较接近“大西洋主义”的，毕竟“大西洋两岸仍是盟友”。^②而中法关系则是“中西关系”属性，原因在于：法中两国在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或分歧。实际上，与其前任萨科齐和奥朗德一样，马克龙主政之初也频频向华盛顿示好并试图与特朗普做“忘年交”，只是因后者过于“任性”而未能如愿罢了。即便在2018年11月马克龙和特朗普在一战纪念活动后发生不快，马克龙依旧克制地表示“盟友之间要互相尊重”并强调美国仍是法国的盟友。

由此可见，法国只是不愿意做美国的附庸并希望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

^① [法国]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变革——为法国而战》，罗小鹏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5页。

^② 李洪峰：前引文，第56页。

的自主权罢了，就本意而言，巴黎是十分愿意交好华盛顿的。在这种情况下，法中战略合作尽管具有诸多有利条件，但对其前景亦不宜盲目乐观。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以及法中两国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法国人的心态已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心理失衡使得法国政界和社会在对华关系的态度上存在倒退的风险，而后者不可避免地将传导到两国在非洲关系上。法、德主导的欧盟委员会在2019年3月12日发布的《欧中战略前景》文件中明确提出要重新审视和评估对华关系。欧盟虽然未像美国那样直白地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但较之其以前的立场已经在后退，欧盟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将中国定性为既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在治理模式领域则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①不仅法德主导的欧盟在对华关系上态度明显倒退，马克龙本人对待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也是反复无常。马克龙2018年1月访华时对“一带一路”倡议基本持肯定的态度，但回国后便出尔反尔，在8月召开的法国驻外使节会议上甚至出言不逊，2019年3月在习主席访法期间马克龙也是闭口不谈或极力回避“一带一路”倡议，甚至对意大利率先参与“一带一路”计划还颇有微词。法中战略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将传导到两国在非洲关系上。当然，听其言，还要观其行。正是鉴于法中战略合作是有条件的，而这些条件本身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因而上述因素是否会影响到法中战略合作，进而影响两国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尚有待观察。

2. 法中对非洲“看法”的差异使两国在非洲的利益摩擦难以避免。

虽然中法两国在非洲关系的演化仍将呈现出一种“竞合”态势，但是在特定的时空内，合作多于竞争还是竞争大于合作，则取决于相关的变量因素或条件。坦率地讲，不能排除中法在非洲关系出现竞争大于合作，甚或发生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因为除了法中战略关系及其各自与非洲关系的演化存在变数或不确定性之外，两国在非洲也存在一些有可能引发利益冲突的“结构性”矛盾。^②这些“结构性”矛盾既源于法中各自与非洲的历史渊源，亦与彼此在非洲的现实作为密切相关。由于法中各自与非洲关系“传统”的差异，加之法中各自与非洲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非洲之于法国与中国的意义或重

^① 王鹏：《欧盟抛出“欧中战略前景”意图何在？》，<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1921?adchannelID=&full=y>，2019-04-05。

^② 参见张宏明：《中国在非洲经略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载《西亚非洲》2018年第5期，第34~35页。

要性不同，进而导致两国对待彼此在非洲活动的“看法”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体而言，这些差异主要反映在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法中两国各自与非洲关系的历史渊源不同。殖民化在非洲绝大部分国家存续的时间虽不足百年，但站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视角，其对日后大国与非洲关系及大国在非洲关系的影响却是持久的。现时大国在非洲的利益关系、力量结构及其攻防态势亦往往是以殖民时期欧洲列强在争夺、分割非洲时所形成“势力范围”作为参照系的。在近代历史中，较之作为非洲最大的殖民宗主国法国，中国毕竟在大国与非洲关系中扮演着“局外人”的角色。这种失位或缺位，一方面使得中国与非洲的联系缺乏具有连续性的传承关系，另一方面也促使巴黎将中国视为闯入法国禁苑的外来者。而法国凭借着与非洲的历史渊源和文化遗产关系则在非洲留存了厚重的遗产，突出体现在，有近半数的非洲国家使用法语，其政治精英或知识精英深受法国文化、价值观念的熏陶，甚至一些国家的宪法、政治体制、文官制度和教育体系也是以法国为蓝本制定的。而中国在非洲却未曾留下多少具有传承性的或对现时中非关系有实质性作用的东西，现代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可谓是另起炉灶、白手起家。

其二，非洲之于法国、中国的意义和重要性不同。非洲在法国和中国各自的国际战略的地位或作用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均扮演着“外交基础”的角色，此外，法中两国均将非洲视为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但非洲之于法国、中国的意义和重要性又有所不同：中国在非洲基本上没有地缘政治利益，而对法国则不然，非洲地处法国所在的西欧南翼，与法国本土安全息息相关。^①非洲战略地位对于确保法国本土安全的重要性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时期被反复印证。因而，较之中国，法国除了在非洲拥有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之外，还多了一层地缘政治上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是，法国2013年颁布的《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不仅再次将非洲特别是北非地区列为“战略利益区”^②，而且还明确重申维系该“战略利益区”的安全系法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由于巴黎将非洲视为法国的安全屏障，因此，如果未来法中之间发生地缘政治竞争，那么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在非洲。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后半叶，法中两国之所以在非洲利益摩擦频仍，原因就在于：巴黎业已将中国在非

^① Conférence Prononcée par le general Méry, chef d'Etat - Major des Armées à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de l'Armement, Défense National, juin 1978.

^② Le livre blanc sur la Défense et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2013, p. 46.

洲的强势存在，特别是影响力的持续提升视为是对法国传统势力范围的蚕食。

其三，非洲在法国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提升。马克龙的外交理念与戴高乐主义或密特朗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其核心目标都是争取大国地位，用以支撑这一战略的两大“地区政策”一个是欧洲联盟，一个是发展中国家，而在上述两大“地区政策”中，又分别以法国与德国合作及法国与非洲合作为轴心，因而马克龙的“地区政策”也可以用“欧洲主义”和“非洲主义”加以概述。在马克龙的国际战略构想中，法德合作旨在推进欧盟一体化建设，使欧洲成为“多极世界”中的独立的一极；法非合作旨在强化法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而巩固法国在欧盟中的核心地位，法国则在欧洲这一极中发挥其“大国作用”。由此可见，非洲在法国国际战略中的排位虽然靠后，但其作用特殊，系法国争取“大国地位”之重要依托。法国官方和舆论界从不讳言：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法非关系，如果法国失去了在非洲的影响力，那么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就无法继续发挥“大国作用”。原因还在于，德国统一后实力大增，并促使欧洲大陆的重心进一步东移，欧洲已不再是“法国的后花园”^①。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债危机后法国经济复苏乏力、国力衰退，进一步拉大了法国与德国的实力差距，德国则日益成为欧盟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更需要借重非洲来增强其在欧盟权力博弈中的地位。马克龙之所以重新祭起萨科齐的“地中海联盟”战略，目的之一就是借此抗衡德国在欧盟内日益上升的影响力。

3. 法中在非洲的“结构性”矛盾彰显了两国在非洲关系的竞争性。

法国与非洲关系的历史渊源及中国与非洲关系的现实状况，使得中法在非洲关系在大国在非洲关系中颇具特殊性。从近年来中国与其他域外国家在非洲关系的外交实践来看，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攸关方”虽然不少，但与中国存在“结构性”矛盾或可能与中国在非洲发生利益冲突的国家却不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在常态情况下，首当其冲就是法国。这里所谓的“结构性”矛盾系指法国与中国在非洲比较难以调和的利益关系，后者涵盖商业利益纠葛、意识形态博弈甚或地缘政治冲突等诸多方面，其中最核心的还是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矛盾。近年来，巴黎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迅速扩展忧心忡忡，认为中非关系的持续快速发展已经侵蚀到了法国在非洲的既得利益，

^① Daniel Vernet, Europe, la fin du jardin à la française, Le Monde, 15 décembre 2000.

于是，中国在非洲正常的活动也被巴黎视为动了法国的奶酪，并认为法国有理理由针对中国在非洲的“攻势”实施“正当防卫”。

其一，中国在非洲活动的增加对法国在非洲利益构成挑战。法中各自与非洲关系在历史渊源和文化遗产上的差异，不仅见诸各自对非洲的情感中，而且也反映在彼此在非洲的利益关系和力量结构中，并且在两国对彼此在非洲活动的感受或“看法”中亦有所体现。国人常言“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不是谁的奶酪”^①，据此，中国自认为加大对非工作力度是中非双方之间的事，不针对、也不涉及第三方。但是，作为非洲的前殖民宗主国的法国却不以为然，在历史上形成的法非特殊关系，使巴黎习惯于将非洲视为法国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施展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所在。时光的流逝并未消磨多少法国根深蒂固的“非洲情结”，时至今日，巴黎仍以“非洲的保护人”自居，并每每以保护非洲利益甚或以非洲利益“监护人”的名义来维系法国自身在非洲的权益。正是由于巴黎业已将非洲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自诩为非洲的“主人”，因而，它将法国之外的所有国家均视为外来的“闯入者”或是“过客”，过去针对的是苏联人、美国人，现在首当其冲针对的则是中国人。马克龙本人甚至也对中非关系指手画脚、说三道四，这在以往法国最高领导人中是非常罕见的。2019年3月中旬，马克龙访问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三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吉布提近年来与中国关系持续升温，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系中非产能合作4个先行先试示范国家中的2个，因此，法国舆论也不讳言马克龙此次东非三国之行意在遏制中国在非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② 马克龙在此次出访东非三国的首站吉布提就告诫非洲国家领导人，从长远来看中国贷款条件是危险的。

其二，中国“走进非洲”扰乱了法国主导的大国在非洲秩序。法国的“非洲情结”，换言之，法国之所以将非洲视为其禁苑，原因就在于，非洲是法国在海外经营时间最长、海外利益最集中、传统影响最深的区域所在。惟其如是，巴黎难以容忍中国在非洲利益和力量存在的快速拓展，这不仅事关大国在非洲力量结构的固有平衡，而且也关系到法国主导的“大国在非洲秩序”的存续。实际上，巴黎反对除法国之外的所有域外国家“染指”非洲。

^① 参见外交部副部长翟隽在2012年7月12日举行的“蓝厅论坛”上所做的题为《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前景广阔》的主旨演讲，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2-07/18/content_25943816.htm，2019-03-15。

^② Le Monde, 12 mars 2019.

因此,如果说中国同法国存在“局地”地缘政治冲突,那么这个“局地”或许就是非洲。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中国“走进非洲”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现实是,作为快速崛起中的全球性大国,中国在非洲的活动的确对法国主导的“大国在非洲秩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突出反映在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和力量存在相对下降,至少在巴黎看来,中国在非洲的频繁活动业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其三,中国在非洲的强势存在有可能削弱法国对非洲事务的主导权。法国与中国在非洲关系的实质是守成大国如何与新兴大国在非洲相处,而维系还是打破大国在非洲既存的秩序是法中两国在非洲博弈的焦点。中国虽然不承认非洲是谁的势力范围,但也没有主导大国在非洲关系甚或取而代之的企图或奢望。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无论主观动机如何,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还是强烈地刺激了法国,而且中国“走进非洲”的速度之快、在非洲活动的动作之大、在非洲影响力提升之快,也超出了巴黎的预期。尤其令巴黎担忧的是,中国业已在非洲的新一轮博弈中占据了主动,而曾经在非洲独步一时的法国反倒处于守势,并且这种攻防态势的转换已经对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存在和力量存在产生了影响。^①作为非洲最大的前殖民宗主国,法国所担心的是,中国在非洲的强势存在将扰乱法国主导的“大国在非洲秩序”,进而发生权力转移,削弱法国对非洲事务的主导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与法国在非洲关系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结构性”矛盾。

4. 法中对非洲政策的趋同性或将加剧两国在非洲关系的竞争性。

法中两国在非洲互为最为主要的“利益攸关方”,因此,任何一方对非洲政策的调整或与非洲关系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另外一方在非洲的利益,进而引起另外一方的反应,这便是法中各自与非洲关系对法中彼此在非洲关系的传导、联动效应。比较研究显示,在20世纪最后10年,法国与中国在对非洲形势发展的判断、工作重心、投入力度、政策目标,乃至重视程度、工作力度、进取精神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上述差异使得21世纪第一个10年法中两国在非洲的竞争中各有斩获、各得其所。^②然而,近10年来,法中各自对非洲政策在诸多方面均呈现出趋同性,例如,法中两国均在加大

^① 相关观点参见张宏明:《如何辩证地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国际处境——兼论中国何以在大国在非洲新一轮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4期,第5~24页。

^② 详见张宏明:《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与非洲经贸合作研究》,第555~574页。

对非工作力度，而且两国对非洲发展前景的看法、两国对非洲工作的重点，乃至施策的着力点也呈现出趋同性，这在以往是不曾见的，上述趋同性或许会加大法中在非洲利益摩擦甚或利益冲突的几率。具体而言，法中两国对非工作方面的趋同性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法国与中国对非洲形势的判断上趋于一致。与 20 世纪 90 年代法国对非洲所持的悲观论调截然不同的是，进入 21 世纪，随着非洲经济渐入佳境，巴黎对非洲看法明显趋于乐观。诚如原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在《非洲新边界》一文中所言：“非洲经济 10 多年来获得了持续、稳定的增长”，对于“整个非洲的未来，我发自内心地深信，非洲大陆将是 21 世纪崛起的力量。”原因在于，非洲经济存在持续向好的条件，诸如：“受到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崛起”，非洲的人口红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丰厚的投资回报率，这些优厚的条件或“财富”均构成了非洲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① 萨科齐认为，法国可以通过强化与非洲的经贸合作，从非洲经济的持续增长中获得益处，以便使法国经济尽早地走出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阴霾。奥朗德则将非洲视为“充满未来的大陆”及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地区引擎”之一（另一个是亚洲），他首次出访非洲就高调宣称 21 世纪是“非洲的时代”，而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法非合作时代的到来。^② 法国官方（“法非经济关系调研小组”）主导的一项研究显示，到 2050 年非洲人口将增至 20 亿，届时非洲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尤为重要的是，非洲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正在持续上升，这预示着法国在非洲中、高端商品市场的拓展空间相当可观。^③ 马克龙同样看好非洲的市场潜力和经济前景并对法国同这个拥有 13 亿人口（2018 年）大市场的合作前景充满期待。^④

其二，法国与中国在对非工作的着力点上趋于一致。过去 30 年，法中各自对非工作的重点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双方施策各有侧重，但其趋向却是朝着趋同的方向演化。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及 21 世纪的头 5 年，较之中国专注于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法国则将注意力放在完善非洲国家民主政治制

① 以上引文出自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题为《非洲新边界》的文章，Le Figaro, 2 avril 2012.

② Le Figaro, 12 octobre 2012.

③ 《Un partenariat pour l'avenir: 15 propositions pour une nouvelle dynamique économique entre l'Afrique et la France》，Rapport au ministre de l'économie et des finances, 4 décembre 2013, remis par Hubert Védrine.

④ Jeune Afrique, N°2979. du 11 au 17 février 2018, p. 3.

度的建构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上。但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随着非洲经济持续向好，非洲作为法国传统市场的重要性又重新凸显。原因还在于，欧债危机后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欧元区经济复苏乏力，法国经济持续低迷，为了提振法国经济，同时也是为了应对大国在非洲日趋激烈的竞争，进而稳固法国在非洲的地位，萨科齐政府和奥朗德政府均将对非工作的重心先转向经贸合作，而拓展非洲市场又成为施策重点。^①虽然法国经济振兴并不仅仅取决于非洲，但两者的关联度在提升却是不争的事实，马克龙曾在奥朗德政府中任经济部长，深谙法国经济所面临的严峻局面。因此，尽管马克龙口头上表示“不再有法国的非洲政策”^②，但实际上，马克龙几乎全盘承袭了其前任萨科齐的“重商主义”和奥朗德的“经济外交”，继续将经贸合作置于法国对非工作的优先位置。近年来，法国加大了对非洲市场的开发力度，尤其看好非洲的服务贸易市场，并利用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加快在金融、保险、航运、通讯等行业的布局。

随着法国对非政策愈加务实，法中两国对非工作的施策重点呈现出趋同的倾向，突出体现在两国均更加看重在非洲获取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实际利益。客观地讲，这种趋同性既便于法中两国在非洲开展国际合作，但同时也预示着两国在非洲关系愈加具有竞争性，后者抑或引发两国在非洲的新一轮利益摩擦。巴黎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快速拓展及在商业利益方面被中国赶超始终耿耿于怀，自然也不甘于坐视中国在非洲做大。然而，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 10 年，法国与中国对非贸易的差距却越拉越大，与此同时，中国对非投资存量与法国之间的差距则不断收窄，超越法国只是时间问题。这对长期经营非洲并已习惯于将非洲视为自己的禁苑的法国的刺激是可以想见的。事实上，过去 10 多年，法国与中国在非洲所展开的商业利益的竞争，既是针对中国持续加大对非工作力度的“被动性”反应，同时也是导致中法在非洲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之一。马克龙呼吁将法非关系纳入欧非关系框架^③是蕴含多重战略意图的：一方面是借助法国在非洲优势地位来引导甚或主导欧非关系，进而强化法国在欧盟中的地位；同时也有借助欧盟的力量强化法国在非洲的

① 张宏明：《法国开拓非洲市场的成就、动因和前景》，载《国际经济合作》2017年第6期，第82~86页。

② Jeune Afrique, N°2969. du 3 au 9 décembre 2017, p. 3.

③ Le Figaro, 30 novembre 2017.

权益和影响，以使法国在大国在非洲的竞争中处于更加有利地位之考量。鉴于近年来法中两国均在加大对非工作力度，而且双方的着力点都聚焦于经贸层面，这种趋同性或将提升两国在非洲发生利益摩擦的几率。

结束语

进入 21 世纪后，中法在非洲关系的演化始终受到各自与非洲关系及彼此战略关系变化以及它们之间交互作用的影响，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这三者互为因果关系，现阶段两国在非洲利益存在和力量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也是“多重关系”交互作用的阶段性结果。近年来，中法两国在非洲所处的攻防态势业已发生了变化：法国迫于自身相对实力下降的背景下，无奈地处于守势；而中国在非洲利益则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得以拓展，并且在诸多方面已经是后来居上、超越法国。

也正是基于大国在非洲力量对比的变化，促使法国在处理与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关系上的态度趋于灵活，政策也有所松动，至少官方已多次重申持“多边主义”的开放政策。不过，法国的开放政策系无奈之举，也是有限度和有条件的，毕竟中法在非洲互为竞争对手，特别是鉴于中法在非洲存在“结构性”矛盾这一现实，中法在非洲矛盾如果不加以调节和管控，两国在非洲发生利益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利益碰撞的频率和烈度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利益冲突。

从趋势上看，“合作中的竞争”与“竞争中的合作”仍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法中在非洲关系演化之常态，但在这种“竞合”关系中，合作多于竞争还是竞争多于合作，则仍将取决于“多重关系”的交互作用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变量条件。由于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彼此在非洲关系、两国战略关系的变化及其交互作用所产生的联动效应本身也受到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国际政治环境、世界经济形势以及中法各自综合国力、内外政策及非洲形势等诸多难以预测或掌控的变量因素的影响，这使得法中在非洲关系的走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不过，鉴于在中法各自的国际战略中非洲都是作为一个局部而存在的，因此，在“多重关系”的交互作用中，较之中法各自与非洲关系，两国战略关系的演化对两国在非洲关系走势的影响更大。

China – France Relationship in Africa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Variables”

Zhang Hongming

Abstract: France and China are the two major extra – regional countries with the closest ties to Africa and the most extensive influence in Africa. The two countries’ relationships with Africa are regarded as the models of North – South and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respectively. As the past largest colonial master of Africa, and with a long history of relations and a complex interest in Africa, France nowadays has been holding an even stronger “sentiment of Africa” and regarding Africa as its own backyard. Despite its relative late arrival in Africa, China has won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 in the new round of competition in Africa among world major powers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s ever – growing strong paces towards Africa would guarantee its relative advantages in Africa. Concerning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nce and Africa, the strengthening tie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would lead to a high possibility of collision or even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By n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nce and China, who mutually labeled each other as the most important “stakeholder” in Africa, is essential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player and the new comer.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at the trends of globalization and multi – polarization would not be fundamentally reversed, “multiple variables” including France – Africa and China – Africa relations (micro), France – China relations in Africa (medium), and China – France strategic relations (macro), together with the change of strength comparison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s well a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re not only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changes of China – France relationship in Africa, but also important perspectives on observing and judging its trend.

Key Words: Afric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 France Relationship in Africa; Multiple Variables; Interaction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